

大连历史文化丛书

# 长夜·曙光

——殖民统治时期大连的文化艺术



大连出版社

大漠孤烟直 长河落日圆

# 长夜·曙光

——成文县的时间断片与历史文化思考



甘肃文化出版社

·大连历史文化丛书·

# 长夜·曙光

——殖民统治时期大连的文化艺术

主 编 李振远

副主编 汤兰升

杨力生

卢 奕

大连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长夜·曙光:殖民统治时期大连的文化艺术/李振远主编

.—大连:大连出版社:1999.8

ISBN 7-80612-677-5

I. 长…

II. 李…

III. ①文化史—辽宁—大连市②艺术史—辽宁—大连市

IV. I 209.93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34450 号

**长夜·曙光**

殖民统治时期大连的文化艺术

大连出版社出版

(大连市西岗区长白街 12 号 邮政编码 116011)

大连市金州印刷总厂印刷 大连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字数:300 千字 印张:11

印数:1—1200 册

1999 年 9 月第 1 版 199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

责任编辑:宋军 责任校对:钟笑

封面设计:田地 版式设计:田地

---

定价 26.00 元

## 目 录

## 大连历史文化的转型时期

- 谈大连地区现代文化的形成及其特征兼序 ……………  
 …………… 李振远(1)

“无风地带”的新文化风暴 …………… 杨力生 汤兰升(20)

傅立鱼和《泰东日报》 …………… 黎生 蓝升(52)

## 不可忽略的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园地

- 简述《新文化》及其关于青年问题的评论与小说 ……………  
 …………… 杨路(61)

为大连引进新剧的第一人——刘艺舟 …………… 蓝升 黎生(83)

## 大连历史上一个重要的作家群体

- 文学团体响涛社的成立及活动 …………… 杨路(88)

大连早期的话剧活动 …………… 丁希文(107)

解放前大连的戏剧班社 ……………

- …………… 马明捷 刘三星 刘长海 孙正刚(121)

大连京剧票社 …………… 丁希文(127)

本世纪初京剧南派艺术在大连的流传与影响·····	林新柏(139)
欧阳予倩在大连·····	汤兰升 杨在青(145)
孙凤鸣和岐山戏社·····	孙正刚(158)
早期的大连曲艺·····	丁希文(169)
大连民间习俗文艺·····	黎生 蓝升(175)
美术活动在大连·····	陈钟远 陈晶(185)
高压管制下的大连电影业·····	于乔(205)
殖民当局对大连的舆论统治·····	汤兰升 杨力生(216)
日占大连后的图书出版与发行·····	杨力生 汤兰升(232)
满铁大连图书馆:日本侵略者的情报基地·····	杨力生(240)
旅顺博物馆的建立与收藏·····	刘俊勇(247)
鸿胪井刻石被盗及其它·····	刘俊勇(253)
罗振玉与旅顺库籍整理处·····	黎生 蓝升(258)
大谷光瑞其人其事·····	黎生 蓝升(261)
满蒙文化协会的成立及其使命·····	黎生 蓝升(265)
1905—1945年日本戏剧在大连演出活动综录·····	····· 汤兰升 杨力生(274)
殖民统治时期在连日本人的文艺社团及其活动·····	····· 黎生 蓝升(290)
1894—1945年大连文化编年纪事·····	····· 汤兰升 杨力生 丁希文 刘银花(301)

## 大连历史文化的转型时期

——谈大连地区现代文化的形成及其特征兼序

李振远

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部书——《长夜·曙光——殖民统治时期大连的文化艺术》，是大连市文化志编纂办公室和大连市艺术研究所的同志们多年来经过多方调查、广泛查询，收集了大量的资料，并加以认真的梳理编辑而成的。本书以较全面地包括正反两个方面的材料和较详尽的缕析，为广大读者提供了丰富的鲜为人知的资料，使大家能比较全面的了解那一段被屈辱和血泪尘封多年的历史真实面貌。本书在纪念大连建市 100 周年之际出版，不仅使我们了解本世纪前 50 年帝国主义侵占大连时期文化发展的历史，填补了大连文化史研究的空白，而且对我们了解大连地区文化发展的由来，认识大连历史文化的优长和缺陷，总结有着特殊遭遇的大连地区文化发展的规律和特点，吸收历史所提供的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从而为现实和未来的发展服务，都具有一定的认识价值和参考价值。本书在编辑过程中，曾得到国内许多地方的专家

和学者的关注,因为中国的一些城市和地区,如台湾、香港、澳门,也包括东北地区曾被日伪侵占的一些城市,都或先或后、或长或短的有着与大连被帝国主义侵占的相同遭遇,因而,研究大连在特殊历史时期文化发展的特殊性,在某种程度上对认识这类地区的文化历史有一定的普遍意义。

自上世纪末 1894 年的中日甲午战争,又经本世纪初 1904 年的日俄战争,直到本世纪中叶 1945 年 8 月日本帝国主义战败投降,大连地区先后被沙皇俄国和日本帝国主义侵占近半个世纪。在沙俄侵占 7 年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占长达 40 年的年代里,大连人民处于漫漫黑夜之中、饱尝侵略和奴役之苦。帝国主义为把大连变为其扩大侵略的基地和跳板,在大连地区实行残酷的政治统治和疯狂的经济掠夺,同时,在文化上野蛮地推行文化专制主义,一方面千方百计地限制、破坏和扼杀中国民族文化和进步文化,另一方面又广设文化侵略机构,大力推行殖民文化和奴化教育,妄图在文化上“同化”大连人民,将大连变成其本土。

在帝国主义侵占并大力推行殖民文化的长夜中,大连地区的文化到底是一种什么形态,大连地区文化的性质和主流到底应该如何确认,是否已经殖民化了,中国的民族文化是否被泯灭了,在那个特殊时期,大连的文化是倒退了,还是发展了,对这些问题,至今人们的认识还不够一致,不够明确。多年来人们不堪回首这一段充满血泪的历史,似乎这一段历史早已随同帝国主义的失败而抛入大海,因而,虽然仅隔半个世纪,但对那一段历史还缺乏全面的了解。长期以来,人们在认识上似乎还有一种定势,认为帝国主义的侵占只给我们留下了屈辱的血泪,因而把这一段历史打入另册,采取了简单的全盘否定的态度,似乎只有这样才是最革命最彻底的。

然而,历史是不能割断的,今日之大连是历史的大连发展而来的,不了解过去就不知今日之由来,也就不了解历史为我们所提供



的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和启示,也就很难掌握大连这个地区、这个城市由特殊的历史遭遇所造成的区别于其它地区的特殊的发展规律和特点。因此,我们既不能割断历史,也不能对复杂的历史现象不加分析地采取绝对否定或绝对肯定的态度。

人类社会的任何一段历史都是由各种力量构成的既有正面也有负面的多面体,而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化,又是渗透于社会细胞之中、积淀于人们心灵之内的极其复杂的社会现象,存在于社会某一时期的各种文化成分又常常会发生既对立又统一,既排斥又联合,既撞击又渗透的复杂关系。因此,面对复杂的历史现象和文化现象,只看到一个方面而忽视另一个方面,采取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态度都是不客观的不科学的。帝国主义的侵略和统治,虽然使我们蒙受了屈辱和血泪,但历史终究不是侵略者一手写就的,归根结底是人民创造的,因此,我们决不能在把污水泼掉的同时,也把孩子倒掉。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我们认识历史、研究历史的一把钥匙,也是我们认识和研究大连地区在帝国主义占领时期所产生的特殊的历史现象和文化现象的一把钥匙,我们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才能对历史也包括大连地区被帝国主义侵占时期的特殊的历史,作出全面的而不是片面的,唯物的而不是唯心的,辩证的而不是机械的科学的结论。

的确,在帝国主义侵占大连长达半个世纪的年代里,大连地区所发生的文化现象是十分错综复杂的。翻开这段历史,我们确实可以看到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统治,使大连地区的文化发展受到严重的阻碍和破坏,也可以看到帝国主义大力推行殖民文化,使当时大连地区的文化具有明显的殖民文化的成分和色彩,帝国主义对大连地区的文化统治确实是处心积虑、无孔不入的,其手段也是十分残酷十分严密的,确实是黑暗如磐、血腥霸道。但是,同时

我们也可以看到,黑夜之中有光华,尘土之中有珍珠。在敌人的残酷统治下,大连人民始终没有停止与帝国主义的斗争,大连地区始终流动着中华民族文化的血液,帝国主义不仅没有改变大连地区文化的基本属性,而且恰恰是在这一特殊时期,由于大连人民以顽强的姿态通过不屈不挠的斗争,不仅捍卫和发展了大连地区的民族文化,而且完成了大连地区文化由旧到新,由传统到现代,由封闭到开放,由单一到多样的蜕变和演进,并形成了以民族文化为主体的开放兼容、多方融汇、多元并存的现代文化的初步格局,成为大连地区文化史上不可忽视的转型时期。

我们得出上述结论,并不否认帝国主义的侵略给大连文化的发展造成的破坏和损害。正如本书中许多文章所揭露的那样,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对大连的文化侵略是无所不用其极的。日本帝国主义深知“欲征服满蒙,必先征服民心”的道理,始终把文化侵略作为其侵略政策的重要部分,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所以,其占领伊始,便建立了一整套文化侵略机构和管制机关,一方面把当地的文化置于军警的严密监视和管制之下,千方百计地限制、破坏和扼杀民族文化,另一方面大力推行殖民文化,控制舆论阵地,推行奴化教育,大肆宣扬和灌输歪曲历史,侵略有理,“同文同宗”,“共存共荣”的谬论,同时还以“开发文化”为名,建立了庞大的文化机构,如“满铁调查部”、“满蒙文化协会”,这些机构打着“开发文化”的幌子,实际上是为其扩大侵略满蒙和中国内地,从事收集情报资料的情报基地和参谋机关。应该说,在几十年间,日本帝国主义在大连已经建立了完备的殖民文化的体系,也造成了殖民文化喧嚣一时污水横流的状况。但是,这种殖民文化是一种靠武力和权势建立起来的畸型文化,是始终与大连人民格格不入的无根的文化,就象弥漫大地的一层毒雾,尽管可以横行一时,但并没有扎根于大连文化的土壤之中,更没有成为主流,因而一旦权势的大厦倾倒,便会烟消云散,大连文化主流真正的根基是帝国主义

统治无法改变的。

也许有人会问,在帝国主义侵占并实行严密统治的条件下,大连地区的政治是殖民地政治,经济是殖民地经济,文化作为政治和经济的反映,自然是殖民地文化,而我们为何却作出了相反的结论?得出如此矛盾的结论是否符合历史事实,是否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

的确,这是一个非常矛盾的现象。可是,在人类文化发展史上,我们可以看到许多这类矛盾的现象。仅以中国为例,元曲的鼎盛恰恰是产生在铁蹄横行的朝代,本世纪30年代上海左翼文化的辉煌也产生于中国历史最黑暗的时期。马克思在1857年所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就曾说过:“关于艺术,大家知道,它的一定的繁盛决不是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因而也决不是同仿佛是社会组织的骨骼的物质基础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恩格斯也说过同样的话:“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在哲学上仍然能够演奏第一提琴。”这就是说,虽然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的政治经济的反映,但是这种反映并不一定是直接的,同步的,往往是不直接不同步的,在特定的情况下甚至是矛盾的。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与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的论述是我们认识在帝国主义殖民统治条件下大连文化现象的一把钥匙。

我们这样说,并不是主观臆断,也不是以个别事实为依据作出的结论,而是以大量的客观事实为依据,并有着深厚的社会的和历史的原因的。

大连地区自古以来就是祖国领土的一部分,千百年来,大连人民吮吮着祖国文化的乳汁,和祖国有着密不可分的血肉联系。早在远古时期,大连就是中国南北文化的通道,深受中原文化的影响。自秦汉直至明清,大连地区虽然地处边陲、战事频仍、民族纷争、时兴时衰,但随着朝代的更迭,经济、交通的发达,内地移民的迁入,在文化上已经完成了与内地文化的融合。中华文化在这里

世代相传，递生代长，打下了深厚的根基，并作为无所不在的血液渗透于社会的细胞之中，积淀在人们的信仰、观念和心里之内，呈现于人们的行为举止风尚习俗之上，已成为维系人心的纽带和社会的灵魂。这种深深扎根于社会深层的民族文化的根基，是任何外来力量在短期内无法改变的。侵略者可以凭借暴力改变一个地区的外在形态，但不能征服人心。在帝国主义统治下，大连地区人民的民族意识不仅没有被泯灭，相反，越是处入沦陷地区的人民的民族意识就越是强烈，他们有着与生俱来的发自内心的维护民族文化的强烈愿望和更加强烈的对民族文化的亲和感。所以，沦陷后的大连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捍卫和发展民族文化的斗争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大连人民与祖国文化的联系也没有被割断，陷入水深火热之中的大连人民与祖国心心相连，不屈的民族灵魂支撑着大连文化的发展。这就是帝国主义无法改变大连地区文化属性的社会的历史的原因，也是大连地区文化的母体——民族文化在特殊环境中顽强发展的动力。

早在帝国主义发动以侵略中国为目的的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之际，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就激起了大连人民的反抗怒火，在大连就出现了一批如《哀旅顺》、《曲氏井题咏》、《阎生笔歌并序》、《闻金州陷》等反抗帝国主义侵略、歌颂爱国志士的爱国反帝的作品，发出了“割土何人成大错，可怜破碎旧山河”和“酒酣拔剑叹望洋，长鲸未斩心忧惶”的激愤和豪情，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大连后，大连人民为保护和发展民族文化，冲破种种限制，兴办以传授民族文化为宗旨的学校，开办保存和传播民族文化的图书馆、书店和印书馆，向广大市民广泛传播民族文化。特别是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来自山东、河北和国内南北各地的移民大量涌入，形成大连地区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移民高潮。来自各地的移民作为民族文化的载体和接受者，使内地文化随之源源不断地传入大连，使大连成为广泛吸收中国南北文化的融合点，从而完成了大连地区历史上最

大规模的和更大范围的与中原文化的融合,使民族文化的土壤和积淀更加丰厚。这种积淀表现在许多方面,不仅表现在中华文化的更大范围的普及,也表现在其他方面,比如由于移民传入作为民族文化的最普遍的存在形式的民族民间艺术和风俗习惯在城乡广泛传播。来自山东、河北、京津地区的秧歌、皮影、大鼓、快书、杂技、相声、民乐、评书,以及来自北方的二人转等源源传入大连,并扎下了根基,成为城乡居民维系民心、表达民意的主要文化活动形式。同时,由于对祖国文化的渴望,作为当时传统文化的主要代表的戏曲活动在大连较以往更加活跃,这种活跃是沦陷后的大连人民向往祖国文化的体现。本世纪初,大连市内就相继建成多处戏曲演出剧场和茶园,戏曲活动由乡村转入城市,河北梆子、山东梆子、茂腔、昆曲、京剧、评剧相继传入大连。许多享誉海内外的著名艺术家如汪笑侬、欧阳予倩、言菊朋、韩世昌等纷纷被邀到大连演出。20年代,评剧在大连兴盛一时,河北评剧艺人孙凤鸣于1922年在大连创办凤鸣社,是国内最早培养评剧坤伶的班社,培养出白玉霜、李金顺、筱麻红等一批名演员,在大连打破了评剧没有女旦的历史,并完成了女腔的创造。评剧女旦、女腔的出现是评剧艺术由唐山落子过渡到奉天落子的重要标志,是评剧艺术的一次重大的革新和发展,而正是在大连完成了这个过渡,为奉天落子的形成打下了基础。话剧艺术也是这一时期传入大连的。作为话剧早期形态的新剧,在辛亥革命之前就由同盟会员刘艺舟传入大连,使大连成为国内话剧兴起最早的地区之一。1911年刘艺舟又返回大连,创办了专演新剧的励群社,演出《明末遗恨》、《波兰亡国惨》等,向广大观众进行爱国宣传。刘艺舟在其亲拟的《组织励群社小启》中公开宣布其宗旨:“当在讴歌俚曲之间而觅爱国励群之道”,“吾国一日不强,吾舌一日不弊。有生之日,即吾奔走鼓吹之年,碎身粉骨,亦吾之所不计”。这震撼人心的呐喊不啻是一纸犀利的战斗檄文。1916年大连文明新剧社成立,社长陈非我又特邀上海新剧

艺术家汪漫游来连编演新剧，上演了《湘江泪》、《猛回头》、《不如归》等具有进步倾向的新剧，使大连的话剧又吸收了上海文化营养。此后，话剧活动在大连便一发而不可收，自 20 年代至 40 年代，大连的话剧班社如雨后春笋般不断出现，上演了许多具有反帝爱国，反封建、反礼教进步倾向的剧本，曲折地表达了大连爱国青年的心声。上述种种，可见大连地区的文化艺术在帝国主义殖民统治时期不仅保留了民族文化的主体，而且由于广泛吸收了中国内地文化的营养，使民族传统文化的积累更加丰厚，根基更牢。

在帝国主义殖民统治时期，大连地区不仅民族的传统文 化有了新的丰富和发展，而且完成了民族文化由旧到新，由传统到现代的蜕变和演进。其主要的标志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二三十年代在大连兴起的以宣传新文化、宣传马克思主义为旗帜的，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特征的新文化运动。自上世纪末大连地区沦陷敌手后，大连人民一直关注祖国的命运，与祖国政治、文化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国内的重大的政治斗争和文化运动，如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及俄国十月革命均在大连引起十分强烈的反响。大连地区的文化发展，也和全国一样，经历了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两个时期。早在辛亥革命前，同盟会革命党人即在大连开展文化活动宣传新思想，并在大连成立了关外起义指挥机关，在庄、复地区打响了关外起义的第一枪，同盟会会员刘艺舟从大连率船攻打山东登黄地区，使大连成为辛亥革命在东北地区的重要战场和策源地。辛亥革命失败后，追随孙中山参加辛亥革命的爱国进步的知识分子刘艺舟、傅立鱼等先后来到大连，继续以文化为武器从事反帝爱国斗争。五四运动爆发后，大连地区又很快成为东北地区介绍新文化、新思想的重要阵地。时任中文报纸《泰东日报》编辑长的傅立鱼等人在《泰东日报》上连续发表文章介绍新文化、新思想。公开抨击当时北洋政府的黑暗和腐败，抵制日货，特别是傅

立鱼等还多次发表文章热情地赞扬和支持俄国十月革命,1919年《泰东日报》在头版上发表了《匈国劳农政府经过实况》,第一次把十月革命介绍给大连人民,热情地颂扬了俄匈两国人民的革命精神,驳斥了反动派攻击列宁“残暴、专横”的谬论。傅立鱼在《六个月的李(列)宁》一文中,颂扬列宁是“群众中的活佛、福星、救世主”,“赞他的都是我们希望自由幸福的平民,骂他的不过是那些专制无艺的军阀,贪得无厌的政客和富而不仁的富户财东罢了”,并指出“我们中国的将来……不问是政治革命、社会革命,不可不先有李(列)宁的行事的精神、态度、意志、方法。”此后,《泰东日报》又连续发表《俄政府正式声明》等文章,公开痛斥“我国旧官僚之北京政府”迟迟不与苏联建交是“唯世界列强之马首是瞻”,“而今世所号称援我之列强政府,吾敢说皆系假仁假义,只有私意,毫无公道”。当时在报刊上发表文章的还有来自国内的进步文人和大连当地的爱国知识分子如汪楚翘、朱枕薪、刘润躬、石三一、李荫泉、林升亭等。他们的文章热情地介绍新文化、新思想,介绍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公开抨击帝国主义的侵略,表现了鲜明的爱国反帝的立场,在沦陷后的孤岛大连点燃了反帝的烈火。1921年春在大连便发生了第一次华商罢市的风潮,10月10日大连市民在殖民统治下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庆祝“双十节”游行大会,学生、工人、市民高举“爱国如家”、“急谋统一”、“实业救国”、“剪除发辫”、“放开小脚”、“勿吃大烟”的旗帜,出现了“沿途观众拥挤不开、军号洋洋、国旗飘飘,诚挚热烈的爱国心高逾云表”(沈阳《盛京日报》)的热烈情景。

1920年,傅立鱼等爱国人士冲破日本殖民当局的限制,在大连成立了第一个公开的爱国进步的文化团体——大连中华青年会,并创办了东北地区第一个传播新文化、新思想的进步刊物——《新文化》,孙中山先生亲自为《新文化》的创刊书写了“宣传文化”的题词。大连中华青年会和《新文化》作为大连新文化运动的嘴

矢，“以发挥中国固有文化之精神，吸收西洋文化之精髓”为宗旨，以“开发文化”、“改革文化”、“谋东北三省文化之发展”，“不至为外来文化所风靡”为目的，通过举办讲演会，兴办图书馆，开办学校和发表文章等方式，广泛宣传新文化、新思想，宣传马克思主义，响亮地拉开了大连地区新文化运动的序幕。大连中华青年会在帝国主义统治的地盘上，第一次鲜明地打出了“中华”的旗帜，以“溯我中华、文明之国、四千有余年……尔国尔家，尔社会，匹夫与有责”为会歌。青年会举办的“星期讲坛”成为最受大连青年欢迎的爱国集会，自建会以来至1926年共举办讲演二百多次，讲演的题目有《中国青年须知》、《青年之觉悟》、《大连中华青年之责任》、《爱国之方法》、《不适宜于现代生活的礼教》、《强权与公理》、《黑暗与光明之消长》、《东俄之见闻》、《社会主义与人类》、《共产主义与中国》等。当时国内的许多知名人士和著名学者胡适、邵力子、汪精卫、伍朝枢、张继，艺术家欧阳予倩和中共大连地下党团的负责人李震瀛、秦茂轩、傅景阳、杨志云等都作过演讲。演讲会打破了当时大连的沉闷局面，广泛地传播新文化、新思想，激发了大连人民的爱国热情。青年会创办的《新文化》（后改名《青年翼》）月刊作为当时东北地区宣传新文化、新思想的一面旗帜，除在大连和东北地区发行外，还发行到北京、天津、上海、青岛、武汉、广州等地，其影响波及全国。孙中山先生在《新文化》上发表了《大亚洲主义》的文章，呼吁“反叛霸道的文化”，提倡“一切民众和平解放的文化”。共产党人李大钊、恽代英、肖楚女也先后在《新文化》上发表文章宣传新思想，宣传马克思主义。当时在《新文化》上发表文章的还有国内知名学者马寅初、陶行知、杨杏佛等。《新文化》还发表了朱枕薪、吴云、光亮等人翻译的介绍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如《一九一七年十一月社会革命之回忆》、《苏俄之新印象》、《无政府主义和科学的共产主义》、《介绍克鲁普斯卡娅》等，1924年列宁逝世后，傅立鱼发表了题为《列宁氏逝世》的悼念文章，把列宁逝世称作“全



人类之损失”，“吾人对此惊天动地一代风云之凋谢，能不寄以深挚之痛悼哉！”

在此期间，由于受“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影响，大连地区以现代小说、新诗歌、评论为代表的文学创作也开始兴起，曾任《新文化》主编的汪楚翘在《新文化》上发表了多篇小说，是大连地区现代小说创作的最早的开拓者，其中篇小说《恶果》描写了在新思潮影响下追求自由婚姻的女性最终仍被封建恶势力吞噬的悲剧，具有强烈的反封建的社会意义。当时，国内有影响的文学家，如叶圣陶、王统照、李健吾等也在《新文化》上发表了作品。《新文化》和《泰东日报》还发表了大量反映大连人民苦难生活、追求光明的具有明显的反帝反封建倾向的小说、诗歌、散文、评论等，出现了大连地区第一次新文学创作的高潮。纵观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其数量之多，形式之新颖，反映内容之深刻，都是历史所未有的，打破了过去封建主义一统天下，形式单一陈旧的格局，标志着现代文化的新鲜血液已经注入大连，大连的文化从内容到形式开始发生了由旧到新、由传统到现代的转化。在此期间，鲁迅、茅盾、郭沫若、田汉等进步作家的作品和《新青年》、《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 A、B、C》等马克思主义的书刊也传入大连，使“五四”以来新文学和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在大连广为传播。今天看来，大连地区新文化运动早期的代表人物傅立鱼等人，作为爱国进步的知识分子，作为追随孙中山拥护孙中山的左派人士，虽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虽然在当时思潮纷杂的情况下，也曾声称“不赞成马克思主义”，在《新文化》上也曾发表和介绍了各种思潮，包括宣扬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的文章，但是，他们在帝国主义统治的条件下，作为先驱者勇敢地点亮了新文化运动的火种，发展新文化、宣传新思想、赞颂十月革命、介绍马克思主义，表现了爱国反帝、拥护真理、拥护革命的鲜明立场，打破了殖民统治下的沉寂，似平地惊雷启迪和催化了大连地区的爱国反帝运动，可钦可赞，功不可没。